



名著选译丛书

古代文史

先秦两汉

已酉年

译注 曹亦冰

阅审 倪其心

说苑新序选译



2 031 0298 0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说苑新序选译



本书责编：李卫红
封面设计：陈世五
版面设计：盛寄萍

•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
(第一批50种)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新华印刷厂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巴蜀印刷厂

1990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0套

ISBN7-80523-357-8/Z·27

定价：(50种) 130.00元

译注

曹亦冰

审阅

倪其心

巴蜀书社

一九九〇年·成都

国家教委古籍整理

『七·五』规划重点项目

671149



10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安平秋、马樟根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

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础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文力

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新序》、《说苑》是西汉刘向编撰的两部历史故事集。

刘向(公元前77——前6年),本名更生,字子政,沛(今江苏沛县)人,西汉后期著名的经学家、目录学家和文学家。他是汉朝宗室,楚元王刘交的第四代孙,历宣帝、元帝、成帝三朝。刘向20岁时,以通达能文入选,献赋数篇,擢谏大夫。后因献神仙方术之书,试验不灵,以欺君罪入狱,由于其兄援救,幸免于死。元帝时,擢宗正。他敢于进谏,用阴阳灾异推论时政得失,屡次上书弹劾宦官专权误国,因而遭受弘恭、石显等人迫害,两次下狱,免官多年。成帝时,改名为向,任光禄大夫,官终中垒校尉,故后世称其为“刘光禄”、“刘中

垒”。成帝河平中，他受诏领校中秘书，负责校勘整理皇家所藏先秦古籍及汉朝以来的图书，编定篇目次第，并撰写“叙录”，后又将所有“叙录”汇集成《别录》一书。是为我国最早的一部目录学和校雠学的专著。《别录》全书已佚，今存清人辑本。他的其它著作，今存有《尚书洪范五行传论》、《新序》、《说苑》、《列女传》等，另有《五经通义》及辞赋三十三篇，亦大多亡佚。

《新序》、《说苑》是刘向领校中秘书时编撰的两部分分类历史故事集。据刘向《叙录》说，他在校勘中秘书、自己所藏以及民间所传《说苑杂事》时，删除其中与《新序》重复的篇章，再予编辑，“别集以为百家后，今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十万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号曰《新苑》。”又据《郡斋读书志》载，《新序》成书于阳朔元年（公元前24年），《说苑》成书于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大概可知这两部书原存旧编，刘向重加整理编撰，有所补充，先成《新序》三十篇，后成《新苑》二十篇，其内容是百家传记所载各种言行事迹，其目的大致是“以助观览”（《汉书·刘向传》）、“欲以为法戒”（曾巩《说苑序》），所以其体例是以内容分类编次。但今存两书，都已散佚。《新序》仅存十卷即十篇。《说苑》

则经北宋曾巩搜集，又得高丽足本，大体恢复二十卷即二十篇原貌。

总体地说，《新序》、《说苑》原是两部供帝王阅览的政治历史故事的类书。它们从记载虞舜夏禹到秦汉史传的各种古籍中选择了可供参资的言论事迹，写作短文，编为故事，“以类相从”，撰次成书。这一特点，从《说苑》和《新序》类目便可见出。《说苑》二十卷，共二十类，依次为：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尊贤、正谏、敬慎、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谈丛、杂言、辨物、修文、反质。《新序》类目是：杂事（五卷），刺奢（一卷），节士（二卷），善谋（二卷）。《崇文总目》指出，两书所载，“春秋事尤多，汉事不过数条”。今存《说苑》共八百四十五章，秦事仅二章，汉事仅十章；《新序》共一百八十三章，秦汉事不过十五章。可见两书主要提供先秦政治历史的经验教训的事例。因此，今天看来，两书既具有文献价值，又具有文学价值。

《新序》、《说苑》的文献价值，主要在于史料的保存，即提供了许多可供整理先秦古籍时使用的历史材料。两书所采史事，见于今存先秦两汉著作的，约三十种。其中，多见于《左传》、《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韩诗

外传》、《史记》以及《孔子家语》；至如《尚书》、《论语》、《公羊传》、《国语》、《战国策》、《大戴礼记》、《礼记》、《易经》、《管子》、《文子》、《谷梁传》、《孟子》、《庄子》、《商君书》、《吴子》、《春秋繁露》、《列子》等书，也间有可见。以两书与上述各书所载同一事例参校，有同有异。其出入之间，或可用作事证，或可用来校勘。而最有文献价值的是两书保存了若干佚失文献和先秦诸子佚说。例如道家《伊尹》、小说家《尹子说》见于《汉书·艺文志》著录，久已亡佚。但《说苑》在《君道》、《臣术》二篇中载有伊尹论政四则，很可能就是《伊尹》的佚文。又如《说苑·建本》中载有“魏文侯问元年于吴子”，或即所谓吴起传《春秋》之说；《政理》中载有“成王问政于尹逸”，或即史载墨家尹佚之佚说。象这样的例子，在《说苑》、《新序》中还是不少的。

《新序》、《说苑》虽然不是虚构的创作，但由于刘向编撰的主要目的是劝诫，因此不仅特别注重思想内容、不甚注意史实考核，而且颇有改编之处，时有评论之语。不少篇章，谋篇修辞也相当讲究，常常采取寓言手法，有的篇章略有魏晋小说意味，因而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较之先秦诸子载籍，两书在故事的编撰和材料的取舍上有下列几种情况：一是与他书相较，对于凡是符合儒家思想观点及道德标准的材料，一般不多改动。如《新序·节士》中的“齐大饥”章，略同于《礼记·檀弓下》“嗟来之食”的故事。《说苑·君道》中的“成王与唐叔虞燕居”章，近似于《吕氏春秋·重言》中的桐叶封弟的故事。再如《说苑·臣术》的“晏子侍于景公”、“齐侯问于晏子”、“晏子朝”、“景公饮酒”等，与《晏子春秋》“杂”、“问”、“内篇”等基本相同。

二是有些篇章虽与他书所载略同，但往往在史实的叙述中加入评论，以突出其主题思想。如《新序·杂事》“楚王问群臣”章，略同《战国策·楚策》“狐假虎威”的寓言；而篇末加评语：“故人臣而见畏者，是见君之威也，君不用则威亡矣。”说明臣威君予的道理。《说苑·建本》“宁越”章，略同《吕氏春秋·博志》中的宁越成材的故事。篇末说：“夫走者之速也，而过二里止，步者之蹉（迟）也，而百里不止。今宁越之材而久不止，其为诸侯师，岂不宜哉。”说明工夫不负有心人的观点。

三是有的故事内容散见于他书，而两书的作者则加以收集编排，所以更显得完整。如《新序·节士》“曹公子喜时”章，在《左传》则分载于成公十

年、十三年、十六年三处。又如《说苑·政理》中的“鲁国之法”章，故事情节则散见于《孔子家语·致思》和《淮南子·道应训》等篇章。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上述几种情况以外，《说苑》、《新序》二书中有的篇章则是刘向自己根据史料撰写的。这种情况的出现，当与作者的编撰思想有关。

《新序》、《说苑》的编撰思想主要是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大致是以儒家仁政为主，而杂以王霸大略。这与成书于汉成帝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有关。刘向身为汉室宗亲，楚王后裔，深切关怀汉王朝命运。他生当汉武帝鼎盛之后，经历汉宣帝中兴之时，目睹汉王朝国势衰颓的趋势，目睹上层统治集团的奢侈腐朽，痛感政治腐败，兼并剧烈。对于社会矛盾的尖锐，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因此，他意图借助先秦至汉世的历史故事，提供政治兴亡的历史镜鉴，以期讽君劝臣，达到整顿朝政、匡救时弊的目的。两书按类设目，就是要通过所列各类故事，告诉帝王将相及士大夫们应当怎样为君作臣当士民，应当怎样振兴汉帝国，应当怎样治理百姓、处理邦交等等。正由于刘向的选择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因此两书所选史事，反映了封建社会政治的若干侧面，揭露讽刺了封建统治者的穷奢极欲，表现了劳动人民对封建统治者的某些愿望情

绪。纵观两书，可以发现《说苑》、《新序》在思想上有这样一些特点：

一，民本思想。《新序·杂事》“哀公问孔子”章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对君主与百姓之间关系作这样的阐述，正是战国以来以民为本思想的延申。《说苑·建本》“齐桓公问管仲”章，借管仲之口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所谓天者，非谓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认为统治者对百姓要宽厚仁爱，布德施惠。《新序·杂事》“梁尝有疑狱”章，写梁国有一件疑难官司，梁王拿不定主意，请教陶朱公，受到启发，认识到对可定可不定的罪案，可以一律免罪；凡可奖可不奖的赏赐，应当一概奖赏。刘向对此深为感慨：“由此观之，墙薄则亟坏，缙薄则亟裂，器薄则亟毁，酒薄则亟酸，夫薄而可以旷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国畜民施政教者宜厚之而可耳！”他觉得统治者对百姓应象春风那样温暖人心，象雨露那样滋润人心。这都表明他对民本思想是极为看重的。

二，轻徭薄赋。《新序·杂事》“赵文子问于叔向”章，记载叔向对晋国六家的中行氏一家最先灭亡的论断：“中行氏之为政也，以苛为察，以欺

为明，以刻为忠，以计多为善，以聚敛为良。譬之其犹罅革者也，大则大矣，裂之道也，当先亡。”明确指出苛政重敛必亡。《说苑·权谋》“楚庄王欲伐陈”章，记叙了庄王对于能否攻打陈国的形势分析：陈国可以攻打，是因为陈国虽是个小国，却蓄积很多。而蓄积多，则赋税必定繁重；赋税繁重，则百姓必定怨恨。至于陈国的城郭高大，沟壑很深，只能证明百姓势必疲惫不堪。果然，楚国很快取下陈国。作者借这个故事，旨在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即赋税的轻重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存亡。所以，要国家富强，必须轻徭薄赋，以取得人民的拥护。

三，禁欲戒奢。刘向为了使这个问题引起统治者的重视，在《新序》书中特撰一卷，名为《刺奢》。而在《说苑》中，除卷二十《反质》专门谈戒奢外，卷一《君道》、卷二《臣术》、卷四《立节》、卷五《贵德》、卷七《政理》、卷八《尊贤》、卷九《正谏》、卷十《敬慎》、卷十三《权谋》、卷十四《至公》、卷十七《杂言》，都有许多篇章倡谈戒奢。二书中列举了大量正反事例，说明统治者奢侈腐化，势必加重百姓的赋税负担。指出“赋敛厚则民怨谤诅”，统治者就会随着人民怨恨情绪的增长而损身亡国。《说苑·反质》“晋平公为驰逐之车”章，讲平公制造一辆供追逐游玩的